

文化周刊

传奇画家的乐清情缘

韩国籍著名画家闵庚灿画展在乐举行

■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琴微

昨日上午，由乐清市文广新局、市外侨办主办的“东艺登高顶，世山列一峰”闵庚灿画展在乐清市周昌谷艺术馆开展，展出了周昌谷先生弟子、韩国籍著名画家闵庚灿先生的50幅精品力作。据了解，闵庚灿画展将持续一个月，到11月11日结束。

闵庚灿先生还向周昌谷艺术馆捐赠了他的八尺巨幅画作《漫山雪压铁杉枝》和一幅竖轴小品。乐清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长赵明皓给闵庚灿颁发了收藏证书。乐清市副市长陈微燕主持闵庚灿画展开幕式。

昨天上午开幕式后，闵庚灿先生接受了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，披露了许多他向周昌谷先生学艺的故事。

报师恩乐清办画展

在昨天的闵庚灿画展开幕式上，闵庚灿先生深情讲述了自己与恩师周昌谷先生亦师亦友的师生情缘。

闵庚灿是韩国仁川人，是一位传奇式的画坛大师，却是浙派绘画的代表人物，师从“浙派人物画”创始人、乐清籍画家周昌谷先生，周昌谷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以人物画获得国际金奖的画家。

1945年，命运将小小年纪的闵庚灿带上一艘美军军舰，他就此来到中国，舰队停靠上海时，舰队少尉把他交给在中国的一个美国牧师。后来，美国牧师又把他托付给自己的学生——一个杭州教会长老，他就这样从南京、上海辗转到了杭州。1948年，周昌谷的姐姐当时在杭州的教会学校担任辅导员，闵庚灿是她的学生。周昌谷先生当时还是国立艺术专科学校（今中国美术学院）的一个穷学生，几乎每周都要到姐姐那里领些零花钱，就这样闵庚灿和周昌谷相识了。

闵庚灿那时候虽然小，却喜欢画画，经常画毛泽东头像，他的铅笔画画得蛮像的。周昌谷觉得他很有灵气，有画画的天分，就开始指导他画画。于是从1949年开始师从周昌谷学画直到他去世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。

“他只比我大6岁，我们吃住在一起，我平时就叫他昌谷。”闵庚灿先生笑道，“周昌谷先生就像我的兄长，他跟我无话不说，他老婆不知道的事我都知道。由于他的关系，我此后认识了黄宾虹、潘天寿等，所接触的都是顶级大师，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新天地。”

“周昌谷先生的用功直接影响了。”闵庚灿说，周昌谷先生即使在养病时，枕头底下也是塞满了书，有空就看书研究西画印象派等西画的色彩运用等，用到中国传统绘画里。

周昌谷先生学过西画，是素描大王。他画的东西在展览会上总是特别夺人眼

球。他画的太阳红得特别灿烂，让人有种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感觉。“我怎么就是画不出这样的效果？当我疑惑地向周昌谷先生询问时，他说，这不是一面画的，是两面上色才呈现这样的效果。”闵庚灿恍然大悟。

“我们朝夕相处，我呆在他的身边，他怎么运笔，用什么笔等。”周昌谷画的小姑娘的皮肤特别细腻，像真的一样，那是反面上色；他画的眼睛特别有神，他研究了五年，运用了浓浓的，浓淡淡……在先生身边，让我学会了很多画作之外不为人所知的绘画技巧和奥秘。”闵庚灿先生由衷地说。

“我将看到的这些用笔用墨的技巧等运用到山水、人物绘画中去，结合起来搞新的创作”。闵庚灿48岁那年回到韩国，他的中国画造诣轰动韩国艺术界，他又根据韩国的民族风格，结合黄宾虹的积墨法，融入张大千的泼彩，锐意创新，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积彩法，将西画的空间、色彩融入其间。他还擅长指画，很快跻身韩国大画家之列。

闵先生一直怀揣深厚的中国情结，72岁又毅然决定回到曾经跟随恩师周昌谷学艺的杭州城定居。几十年来，闵先生致力于中韩文化交流，推动韩国的中国艺术热，促使许多韩国青年来中国学习，一直是中韩友谊的重要使者。

明年是周昌谷先生诞辰90周年，为了感恩良师益友周昌谷先生，早在去年，闵庚灿先生就与乐清联系筹备此次画展，展出的50件精品力作中，有十件有周昌谷先生题跋，展现了他们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深厚的师生情缘。

昨天下午，闵庚灿新收的7名弟子包括一名韩国徒弟都特意到周昌谷艺术馆举行拜师仪式，朝拜周昌谷这位太师爷。闵庚灿说，希望能通过这种仪式，将周昌谷先生对艺术的执著这种精神传承下去。

怀深情三度来乐清

“这是我第三次来乐清。”闵庚灿先生尽管今年已80多岁高龄，白发如霜，但依然神采奕奕。闵庚灿先生与乐清有着不解之缘。

他告诉记者，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还在浙江话剧团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来温州演出，他就抽空来了一趟乐清，去玩了慕名已久的雁荡山。

第二次是六年前周昌谷艺术馆落成开馆时，作为周昌谷先生的高徒，他在当天研讨会上声泪俱下的回忆，感动了在场很多人。

这次来到恩师的故乡举办画展，不仅是师生之间的世纪回眸，更是和乐清的再续前缘。

闵庚灿画展吸引了众多书画界的知名人士。

“《云山雨霁》《曲终人不见》等，几乎每一幅画，都有一个故事。”在展厅，闵庚灿先生边走边聊，兴致盎然地为大家讲述画作背后的故事，还披露了一些画作独特的创作技巧。

闵庚灿先生擅长画山水画，画风泼辣粗犷为清健，演浓黑为明丽，去繁复为凝练，不仅广采博取，继承中国浙派、海派、长安画派名家大师的运笔用墨精髓，而且锐意创新，以开阔的视野将笔墨与色彩在中国画中运用到极致，被书画界誉为“东方之光”。

当天展出的作品以大幅见长。闵庚灿先生厚积薄发，出手很快。他指着展厅里八尺大作《漫山雪压铁杉枝》告诉大家：“脑子里都是这些东西，大笔一挥，两个小时就完成了。”让参观者叹为观止。



闵庚灿（左一）在展厅讲解绘画创作技巧。徐琴微 摄

在母语的时空射雕



傅国涌课童一年，带着童子们到北京游学，在北大未名湖畔读书。

■傅国涌

戊戌之秋，满城流淌着桂花的香味，这是杭州一年中最好的时候。国语书塾童子班开班一周年，正好我们从北京游学归来。

回望过去的一年，展望未来的岁月。我只是想在母语的时空里垂钓、采菊、种豆，钓的不是鱼，采的乃是美，种的却是善。与儿童站在一起，为生命中新的大欢喜、大因缘。余生有限，仅此而已。

母语时空浩浩渺渺，横无际涯，童子们将以小提琴、吉他演绎《天空之城》，以竹笛吹出《射雕英雄传》主题曲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恰好也是《在母语的时空射雕》。1935年12月5日，胡适先生写信给如日中天的天津《大公报》主笔张季鸾先生，开头就称许他：“射雕老手，箭不虚发”。

对于我，儿童母语教育是个新的领域，虽然三十一年前我就是一位乡村中学语文老师，但母语却是我从小在雁荡山的石头与碧水、白云与清风之间千遍地淘洗、锤炼过的。从中国古典小说、古典诗词、《古文观止》到《水经注》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从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到朱熹、王阳明、曾国藩，从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穆到费孝通、钱锺书，从鲁迅、胡适到沈从文、萧红、张爱玲，从梁启超、邵飘萍、张季鸾到储安平、殷海光、金庸，我从少年到壮年，从雁荡山到黄土地再到西子湖，一路跋涉，在母语的山水之间，不仅饱览了最美的风光，也呼吸而领会到了母语的奥秘。

尤其最近的二十年间，也就是我三十岁之后的岁月，作为一名天天使用母语的思想者、写作者，我敬畏母语——开放的、有容乃大的母语，当然也是源远流长、绵延不绝——从甲骨文、金文的时代，《诗经》的时代一直流淌至今的母语。

母语就像今天的桂花一样是洋溢着香气的。不仅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唐诗宋词，也不仅先秦诸子、汉赋骈文、《红楼梦》，就是《国语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乃至《史记》以降的二十五史中，也一样流淌着母语的香气。母语的四季都有花开烂漫，风光无限。在中国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传统中，文史不分家，文史哲所指向的人文世界天宽地阔，它们互不隔绝，相互依存。

母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世界，并与自然界相连接，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王维的“人闲桂花落，鸟鸣春山空”，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……正是在这些朴素自然的文字中藏着母语的密码，并非高深莫测而永远神秘如初。我想起甲骨文中的卜辞：“今日雨。其自西来雨？其自东来雨？其自北来雨？其自南来雨？”佚名的《江南》诗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吴均、王维、郾道元和柳宗元笔下的山水，王羲之、李白、苏东坡心中关于时间的变与不变，归有光对日常生活体悟的一笔一划，《石头

记》对人性倾注的全部关怀……共同构成了母语的生命。

作为历史的研究者，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，我沉浸在《国语》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构筑的史家传统中，纪传体和编年体都是我最为熟悉不过的表现方式，《金庸传》《叶公超传》《1949年：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》《主角与配角》《大商人：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们》《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》等无疑都可归于纪传体的谱系，《笔底波澜》《民国商人：追寻中国现代工商业的传统》则属于编年体的谱系。直到2011年和2017年完成的《百年辛亥》《新学记》，我才从这些古老的表达传统中解放出来。

另一个王韬、梁启超他们开创的文人论政传统，经张季鸾、胡适、傅斯年、储安平他们发扬光大，到殷海光、查良铮仍在台港余音袅袅，我在十八年前自创了“言论史”这个说法，就是追溯这一文人论政的传统。虽然当我生时，这个传统早已中断，但我有幸在纸媒最后的风光中，在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东方早报》《科学时报》《新京报》等许多媒体撰写时评专栏，已集成的有《偶像的黄昏》《得寸进寸》等。

历史研究和非虚构的随笔、时评写作，几乎耗费了我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大部分光阴和精力。我相信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。”（傅斯年语）我也相信，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。”（韩儒林语）作为民国史的研究者，我被民国教育深深吸引，透过吴式南先生、徐保土先生、盛笃周先生、盛牧夫先生、滕万林先生、许良英先生，事实上，我也间接享受了民国教育的恩泽。

去年的10月7日，“国语书塾”正式在杭州开课，何谓“国语”？不仅因为《国语》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，“五四”以后的国文教科书小学阶段就叫“国语”，《新学制国语教科书》曾风行一时，叶圣陶先生、丰子恺先生合作完成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更是异军突起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莘莘学子。我也是读着他们的书长大的。

追根溯源，我在五十之年自创“国语书塾”，上承古老的《国语》的传统和民国的国语课血脉，可谓有根。外接《荷马史诗》以降莽莽苍苍的世界人文传统，那是我们向更广阔的世界伸出的枝条。从奥古斯丁、莎士比亚、堂吉珂德到亚当斯密、托尔斯泰、爱因斯坦、博尔赫斯，从西塞罗、蒙田、洛克到雨果、歌德、梭罗、爱默生，从屠格涅夫、普希金、雅斯贝斯到泰戈尔、纪伯伦、哈维尔，正是这些人物、作品书写了一部“笔尖上的世界史”。

积四十余年阅读之经验，我深知，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，还须行万里路。一年来，我们从身边的富春山水、山阴兰亭、三味书屋、百草园、白马湖到长城、故宫、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……从希腊到意大利、荷兰、法国，我们将顺流而下，亲近人类文明史的花开花

谢。这一年，童子们脚步和心灵抵达之处，也是他们在母语的时空空练习射雕之时。我想起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1936年初任浙大校长时发表的《旅行是最好的教育》，十六、七世纪之交，英国思想家培根的《论游历》同样认为这是年轻人教育的一部分。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无非为了成全人，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。希腊古老的箴言“认识你自己”。到底要追求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九十一年前，梁启超写给儿女的信中已说得如此清晰：

“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，试问唐开元、天宝间李白、杜甫与姚崇、宋璟比较，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？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，姚、宋之有无，算不得什么事，若没有了李、杜，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？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、杜，不做姚、宋，要之，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，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，以请教于社会，人才经济莫过于此。思成所当自策厉者，慎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、杜耳。如其能之，则开元、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，算什么呢？”

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这是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的诗。李、杜诗篇可穿千古，姚、宋功业只是一时，世人早已不再关心他们为何许人。梁家子女九人个个成器，院士三个，其中长子、次子1948年双双成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毫无疑问，作为母语时空的射雕者，梁启超依然在场，（几年前童子们还在他的墓前背诵了《少年中国说》。如果说，他和王国维是上个世纪的“七零后”，张季鸾、鲁迅是“八零后”，胡适、钱穆、陈寅恪、傅斯年他们是“九零后”，那么，沈从文、王芸生、叶公超他们则是“零零后”，萧红、张爱玲、费孝通、钱锺书他们是“一零后”。

“国语书塾”的童子们则属于本世纪的“零零后”“一零后”，与上述射雕者相距百年，我当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他们也可以成为母语时空的射雕者，前提就是最大限度地掌握母语的密码，能准确、流畅、优美地使用母语。今日之努力并非只是为了今日，除了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享受母语之美、之善、之真，最终成为纵横母语时空的射雕者。1932年夏天，朱光潜先生客居莱茵河畔，在《论美》书简的最后提及，阿尔卑斯山谷中间有一条大汽车路，两旁的景物极美，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：“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

面对正在母语时空练习射雕的童子，我也想对他们说：“请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未来在他们自己手中，“我手写我心”，愿他们都成为母语时空真正的射雕者。

